

大象学术书坊

理学古文史

束有春 著

大象出版社

大象学术书坊

理学古文史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学古文史/束有春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1. 11

(大象学术书坊)

ISBN 978 - 7 - 5347 - 5981 - 9

I. ①理… II. ①束…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
中国—唐代~清代 IV. 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269 号

责任编辑 李光洁

责任校对 牛志远 李建平

封面设计 王晶晶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8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5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束有春，1956年3月生，江苏仪征人，文学硕士，研究员。长期以来，

虽然工作环境发生变化，但能始终以一个学人长期养成的求真务实精神来开展工作和学术研究。先后发表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学、美学、民俗学、文物学等方面的论文20多篇，参加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校订并出版《册府元龟》15卷160多万字，该书荣获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另出版有《中国历代婚姻事典大观》、《江苏文物古迹通览》、《江苏戏曲文物研究》等书籍多种，其中《江苏戏曲文物研究》荣获2008年度「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称号。《理学古文史》是作者积十余年之功而完成的又一项研究成果。



序

金秋季节，正值收获旺季，物质和精神领域皆可相通。这不，老同学束有春研究员送来了他的大著《理学古文史》，命作序，这对我来说可说是且喜且惧：老同学新作即将面世，辛勤劳动终见成果，自然一喜，但对写序却又一惧：在我的心目中，作序多应为前辈大师、鸿才硕儒，我则两者皆非，何敢提笔。况且这些年我对戏曲史论关注较多，虽也时有旁骛，面世过一些文史论著，总觉有点隔靴挠痒，难落实处。但有春兄是我30年前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同样负笈关中，在号为人文渊藪的古都西安完成研究生学业，又先后辗转来到有“金陵佳丽地”之誉的六朝古都南京工作和生活，可谓今生有缘，自与他人不同。既然固辞不获，也只好勉力承乏了。

理学、古文，分属二途，一为思想史，一为文学史，历来各行其道，应无瓜葛。然思想非有形之物，除在当时当地讲授口传外，非形诸文字即难以广泛传布，更难以流传后世，故不管那些持有“文章害道”观念的理学家本人是否愿意，也无论他们的文字是否达到上乘，一旦形诸笔墨，即自然入了古文之列。况即就文学价值而言，理学家笔下的古文也不无可称道之处，起码我们不能完全漠视诸如《爱莲说》、《西铭》等理学名篇，它们多年来一直吸引着读者的目光，恐怕不完全是由于理学内涵的缘故。另一方面，考究理学古文也更有助于系统全面地把握文学史。谁都知道，我国古人治学素有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将理学与古文统合起来，考论其源流及利害所在，倒也有史可征。既就今天而言，对理学古文进行彻底清算，于思想史固无关涉，于文学史倒是实实在在地多了一个视域，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不无鉴戒之效。韩愈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

说的也许就是这个道理。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对理学古文抱着视而不见的鸵鸟态度,似乎它们与文学无关。但事实证明这并不符合文学史的实际。固然,“唐宋八大家”不能说是理学家群体,明前后七子和唐宋派及归有光的散文亦不能完全归入理学古文的范畴,顾炎武等清初散文更可以说是对理学古文的反动,但所有这些并不能作为摒理学古文于文学史之外的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习惯了一部散文史,也许正是因为治史者过多重视人们熟知的古文名家名篇,从而缺少对文学史作整体观照的结果。而毋庸置疑,缺少全面和系统把握的文学史是难称科学的。更何况,从力图同时振兴道统和文统的韩愈,到标举“义法”,作为有清一代散文主流的桐城派古文,离开理学一脉便无法讲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春兄选题精当,目光独到,并为此肆志多年,爬梳剔抉,艰难备尝,终成30余万言专著,可谓功莫大焉!

从思路安排及章法结构上看,眼前这部《理学古文史》,自中唐韩愈文道观切入,而以宋代古文六家和程朱理学古文互动为重点,旁及哲学与政治,以此带动元明乃至清和近代,应是抓住了论题的肯綮,没有平均使用力量。全书九章,涉及理学精神对辽金文风的渗透,理学古文在元代的复苏与振兴,以至明清理学古文的消长,可以说所有理学及古文的重要问题作者皆未回避。有的宏观勾勒,线条粗犷而清晰,如宋以后理学的发展脉络;有的微观剖析,条缕细致而深入,如历代的古文家与理学名家。前者突出其与理学之不可分的关系,后者则重在其在古文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特别论及《爱莲说》、《西铭》等理学古文诸名篇,凸现其说教和情采的矛盾(“二律背反”),加之对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的辽金元理学古文精神的开掘,均能发人之所未发。非但于此,书中论定清末曾国藩以“经济”充实桐城派古文的“义理、考据、辞章”,从而成为桐城派中兴功臣等问题的论述,尤见目光独到和功力深厚。写法上,该书融理论观照和篇章点评于一炉,可谓新见迭出,同时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读者也许不一定同意书中的全部结论,但对著者涉及的诸多以前不为所知的材

料内容却不能不正视,对传统文学史特定时期相关领域的若干现象必须重新思考,即存在着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今天我们知道,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不断创新,创新有论题取得明显突破和启发后人深入思考两种。《理学古文史》既在选题方面另辟蹊径,有拓荒之功,又在具体论述中敢发新见,收启发思考之效。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春兄近几年由文学、文史而文物,从而视野开阔、触类旁通的结果。

当然,由于理学和古文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将其结合起来系统研究,并欲在传统文学史领域增设理学古文史一类,如何论述方为恰当和到位,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对于理学和古文本来相差较远的情况下,不讲清理学本身问题,理学古文就很难一下子叙述清楚。但理学古文毕竟重在“文”而不在“理”,如果古文方面论述不能全部到位,就很容易被“理”所淹没。这样就更增加了论述的难度。眼前这部专著,总的感觉对理学本身谈论似嫌多了点,而对理学古文自身的发展似嫌分量有所不足,对理学之于文学的消极作用似乎也开掘得不够。然而,这点不足又是一个新课题的探讨所难以避免的,它们起码可以启发人们作进一步深入思考,为将来的完善提供一个实实在在的出发点。

这是春兄进入新世纪后的又一部学术专著问世,以他身处全省文化(文物)管理工作岗位上的忙碌,有此成果,实属不易。愿他继续忙中取静,在心理上永远享有学术的春天。

徐子方

2009年9月2日于南京味宁轩

作者系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目录

序	1
第一章 理学古文：在“文道观”夹缝中潜滋暗长	1
第一节 “文以载道”观与唐宋八大家古文系统	1
第二节 《复性书》对理学古文的促萌	15
第二章 宋初古文复兴与理学文化氛围的孕育	22
第一节 古文复兴中的理学文化因素	24
第二节 宋初“理学三先生”与古文	34
第三节 范仲淹古文中的理学精神	46
第三章 北宋古文主流与理学基本精神	54
第一节 欧阳修的道德文章	55
第二节 曾巩之文与理学	64
第三节 王安石之文与理学	69
第四节 “三苏”之文与理学	86
第四章 二律背反：理学家古文的说教与情采	104
第一节 周敦颐及其《爱莲说》	104
第二节 张载及其《西铭》	110
第三节 “二程”及其后学之文	122
第四节 朱熹及其后学之文	146
第五章 宽容与禁锢：理学古文的不同命运	174
第一节 古文家的宽容	174
第二节 哲学家的扬弃	189
第三节 政治家的禁锢	219

第六章 理学精神对辽金文风的渗透	228
第一节 理学精神对辽国文风的渗透	228
第二节 理学精神对金国文风的渗透	232
第七章 理学古文在元代的复苏与振兴	251
第一节 耶律楚材理学古文的承启作用	254
第二节 许衡理学古文的北风南折	257
第三节 刘因理学古文的廓大气象	266
第四节 吴澄理学古文的典雅富丽	281
第五节 虞集理学古文的雅训平和	292
第八章 明代：理学古文的前后异响	296
第一节 “明初三老”及其理学古文	296
第二节 明代中期理学古文的主导地位	308
第三节 明代末期理学古文的反动	320
第九章 清代：理学古文的沉寂与崛起	333
第一节 清初理学古文的沉寂	334
第二节 桐城派理学古文的崛起	342
第三节 理学古文的再次沉寂	350
第四节 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的中兴	354
主要参考书目	365
后记	368

第一章 理学古文：

在“文道观”夹缝中潜滋暗长

“古文”一词，从文体上讲，原指先秦两汉以来用文言写的散文，发展至中古以后，它是相对于六朝骈体文和后来的科举应用文体而言。最早将散文文言文称为“古文”者，是唐代的韩愈。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指出：“愈之为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自此，中国古代散文又被别称为“古文”。

“理学”又称“道学”，主要指宋儒糅合佛老以阐释义理、性命，以传承孔孟儒家传统文化的一种哲学思想。理学虽诞生于宋代，但理学古文的产生却必须追溯到唐代中晚期，并且又与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有关。

理学古文发展史研究的序幕必须从中唐揭开。

第一节 “文以载道”观与唐宋八大家古文系统

唐宋古文家们所致力于复兴的古文道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渊源有自的。所谓韩愈倡导的“道统”，抑或是唐宋合璧形成的“唐宋八大家”古文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其根本所系。对于这一问题的简略回溯，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在“文道观”夹缝中潜滋暗长起来的理学古文，不仅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更能让我们领略到它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长河中有着海天一般的领域，它自成体系，别有洞天。

“唐宋八大家”之称始于明代，是指唐宋两代八个散文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最早将这八个人文章合为一集的是明代朱右的《八先生文集》，唐宋“八家”之名实始于此。但朱右的本子早已散失。明代中叶，在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亦仅取这八家。其后，茅坤本朱右、唐顺之之说，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深广，遂流传至今。据《四库全书·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右书今不存，惟坤此集为后世传习。凡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抄》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唐宋八大家古文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出现的一幅最为壮丽的画卷。八大家纵跨两个朝代，时间跨度达300年之久。八大家们在文坛上彼此呼应，形成共识，对唐宋时代乃至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散文甚至成为后世一切为文者的典范。八大家与之前之后的散文家相比，其散文创作的特点在于：都共同强调“文以载道”（或曰“文以明道”）的文学创作方向，走一条文学“宗经”、“明圣”、为时为事服务的道路，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创作了大量优美的、文学色彩浓郁而又契合时事的散文，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引航导魂的作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以“文以载道”为特色的唐宋八大家古文系统。

唐宋八大家古文系统是经过多少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它是由无数条涓涓细流经过无数次整合而形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眸一下中国古代散文史中有关“文道”问题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殷盘”、“周诰”时代。先秦诸子散文的出现，一改诸如《尚书》、钟鼎铭文的佶屈聱牙现象，使散文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思维载体，中国散文的发展在这里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的文化政策，集六国文字于一系，融六国方言于一炉，从而使汉语语汇一开始便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势头。由于汉语中的一字多音、一音多义、一义多字等现象的存在，形成了汉语言有别于他种语言的独特文学现象：词汇丰富。直至今日，在全世界几大语种中，汉语仍以其文字内涵最丰富、

包容性最大而著称,这种丰富的语言词汇为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厚广袤的土壤和发展前景。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变化,人们思辨能力的日益提高,用生动活泼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情达意,已成了一种社会需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范本。但是从东汉起,古代散文已开始出现讲究雕饰而远离口语的倾向。到了魏晋六朝时代,文坛上开始出现了专事藻饰、形式工巧的“骈文”。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只求文章字句的对仗华美、用典巧妙、音调谐和,而内容却往往严重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民众生活,使文章成了少数上层贵族的赏玩装饰品。尽管其间也曾出现过像鲍照、庾信等人写就的题材严肃、感情真挚的作品,但终因文体的限制与人群力量的稀薄而难成大气候。古文创作与发展再次面临着危机。

也就在魏晋六朝骈俪之文盛行的同时代,文坛上即已出现了对此种文风进行纠偏不满的呼声。据《北史》卷六十三《苏绰传》载:“自有晋之际,文章竟为浮华,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苏绰的文章如“六条诏书”等,全用单笔,实为文章复古的最新篇章。但是,这种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且用提倡《尚书》这种质木无文的“谟诰体”式散文来抵制骈俪之风,也显然有悖于文学发展规律,所以,魏晋时代出现的这次最早的散文反骈运动,最终未能取得效果。

到了隋代,文学界的反骈斗争仍在继续。隋朝治书御史李谔有感于骈文“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的弊端,上书隋文帝杨坚,坚请革除文风之弊。隋文帝曾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①但是,由于他们将文艺的审美价值与政教作用对立起来,把对文艺的审美追求看成是浮靡堕落,这样,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也同样违背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致使文坛反骈运动难以深入开展。

隋末思想家王通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力斥魏晋六朝以来的绮靡

^① 《隋书·李谔传》。

文风。他在《王道篇》中指出：“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在《事君篇》中又指出：“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首次明确打出了“文以载理”（即“文以载道”）的旗帜，主张文章只有“贯乎道”、“济乎义”才有存在的价值。正是由于这一文学主张，王通在后世学者的眼中，时常同扬雄、韩愈等人并列，被称为是“道统”中人。由于隋朝国祚短暂，加之隋炀帝醉心于南朝宫体文学，所以，有隋一代，骈文仍在唱主角。

初唐时代，唐太宗及群臣虽然意识到魏晋六朝以来绮靡文风的社会危害，一些有识之士也希望骈俪之文能得到扼制，但由于李世民生平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又必须借助文学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所以，唐初虽然对魏晋六朝文风中淫艳放诞的一面予以禁绝，但对骈文这种文学样式却持保留态度，当时的“上官体”就是一种新时期的骈文，深得皇上欢心和欣赏。初唐时，有些作者如“初唐四杰”及魏征等人，尽管也力图创作散体文学样式，但终难跳出骈体文的窠臼，笔下常有骈体文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武则天时代，因其喜爱文学，不少官员因文才藻丽、辞彩飞扬而被朝廷青睐，以此而飞黄腾达者时常有之。朝廷上下，竞相追逐华丽文风，骈文几乎占领了整个文坛，散体式文章继续遭遇冷落。

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真正称得上是古文运动先驱者的是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其《修竹篇序》虽因诗歌而发，却系统地表明了他的文学观。他首先批判了魏晋六朝至唐初的淫丽文风，继而提出了诗界革新理论纲领，强调文章要有“风骨”、“兴寄”，追求充实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的统一。陈子昂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创作了许多优美的散文，其中虽不乏骈文句式，但主要以散句为主，且内容充实，与时代贴近。他的《上蜀川安危事》、《谏用刑书》、《上军国利害事》、《谏灵驾入京书》等，援情入理，言辞凿凿，切中时弊，与那些阿谀奉承之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坛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部分书信体、碑铭体散文，大量吸收《史记》等史传文学的笔法，别

具特色，实开韩愈古文运动之先声。

盛唐之世，继陈子昂之后，萧颖士、李华、贾至等人为了突破魏晋六朝的藩篱，提出了复兴风雅、效法三代古文，以古文古道的方式为大唐盛世服务的文学主张。如李华在《李遐叔文集·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指出：“文者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他的《三贤论》、《正交论》，以及《贤之用舍》、《君人牧人》、《国之兴亡》、《材之大小》等，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为文要宗经济世的观点。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盛唐元气大伤，文学变革的主张也随之而搁浅，唐代文学随着世运的改变而进入中唐时代。

“安史之乱”平息后，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文人墨客开始苦苦思索拯救国运的良计妙策，那种专事粉饰太平的骈俪之文已与现实格格不入，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进一步摆在了文人面前。加之当时社会上佛、道盛行，严重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因而，从唐德宗的贞元至唐宪宗的元和年间，文学复古思潮再度兴起，且声势浩大，尊儒反佛老和倡导古文道统已成为天下大势。继萧颖士等人之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崔元翰、权德舆等人进一步主张用散文来“尊经”、“宗道”，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为“古文运动”暴风雨的到来奏响了雷鸣之声。

韩愈、柳宗元的出现，终于使“文以载道”古文运动达到了高潮。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所指出：“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歌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愈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打着复古旗号的文学革新运动，它在“文以载道”旗帜下，进行了两方面革新：一是文体革新，即用三代秦汉的标准散文取代骈体散文；二是文风的革新，即用文质相符的文风取代华而不实的文风。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韩、柳的门人、朋友等，诸如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吕温、张籍

等。这些学人们虽然在反佛老问题上有差别,但在崇儒问题上则目标一致,他们把“中兴”、“救世”的希望都寄托在儒学的复兴上,而追求以新体散文为文章的载体。在这场古文运动中,尤以韩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最大,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25岁中进士,29岁踏入仕途,先后任汴州观察推官、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职。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当时关中大旱,百姓饥饿,上疏指斥朝政,请求减免徭役税,被贬为山阳令。后又召回,历任国子博士、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擢升为吏部侍郎。两年后,因谏宪宗迎佛骨,触怒宪宗,几至被杀,幸亏裴度营救,被贬为潮州刺史。几年后,又调回京师,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57岁病故,谥号为“文”,故后世称为“韩文公”。有《韩昌黎集》50卷传世。

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旗帜下进行的一次以恢复儒家道统为主要目的的文体文风变革,“文以载道”是他古文理论的基点。他在《答李秀才书》中申明:“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并且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命。他在《原道》中宣称:

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之言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

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局面!按照韩愈的分析,孔子的儒家学说将面临被佛老吞噬殆尽的悲惨命运。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方面来自佛老势力的强大,强大到要将“孔夫子”吸收进它们的系统,成为它们的“弟子”,但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本来信奉孔子学术思想的人,

在佛老的蛊惑之辞面前，也失去了方寸理智，要将儒家思想理论归口到佛老门下。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形势对儒家思想十分不利，可以说已到了糟糕地步。为了挽救儒家思想的厄运，韩愈要从根本上找到一剂灵丹妙药，这就是儒家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道统”。韩愈接着指出：

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仍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齔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明确表示了自己崇儒学、辟佛老的政治主张，且以孟子之后的又一个道统继承者自居，主动担负起了儒学兴亡的重任。为了给“道统”扫清障碍，韩愈公开对佛老下了挑战宣言，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铲平佛老痕迹，大有“焚书坑佛老”之态势，表现了韩愈卫道者的坚定立场。

像《原道》这类出于捍卫儒家道统而又阐释自己文学主张的政论散文，韩愈还写了不少，如《论佛骨表》等就是如此。他的“文以载道”之“道”，首先表现在排佛老、关心社会危机这一点上，其次表现在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这一人生观念上，对之前的传统儒家思想采取了继承与扬弃相结合的态度，他的《上宰相书》就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希望做官以便于“行道”的愿望。在《后二十九日复上书》中又明言：“古之士三月不仕则相吊，故出疆必载质。然所以重于自进者，以其于周不可则去之鲁，于鲁不可则去之齐，于齐不可则去之宋之郑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韩昌黎集》55卷中，诗不足10卷，其

他除赋外,都是古文,有 300 多篇。其创作的古文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杂著,包括政论、小品、杂感、读书笔记;第二类是书序;第三类是碑志。韩愈通过自己的勤奋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写作形式,这是此前的所有有志于“道”者所不能比拟的。

韩愈古文的最大特点是“气盛”。他在《答李翱书》中反复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苏轼曾评价韩文是“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皇甫湜赞誉其文是“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这些评价,形象地揭示了韩文的特点,较为中肯。韩愈也自诩其“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辞”^①。说明他是从内到外都要将虞夏商周之文全面接收过来,为现实社会服务。但是,他同时又十分强调与注重“惟陈言之务去”的创作风格,所以,他的散文中,富有时代气息的语汇极为丰富,诸如“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俯首贴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等,通俗易懂,内涵丰富。这些语句生命力之强,至今仍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应该说这是韩愈将传统语言糅进现代语汇的一种发明创造,是吸收传统语汇的结果,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贡献。韩愈除了对传统语言进行合理吸收、对传统文体合理继承外,还自创了“解”、“杂说”等文学性很强的杂文体裁,如《师说》、《杂说》、《进学解》等,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文体在他的手中变活了。在韩愈的笔下,只要能够表情达意,能为“道”服务,文体可不拘一格,纵然对于骈体文样式,他也给予合理吸收、消化、改造。他的文章讲究排比修辞,借以增强文章的气势,不少文章讲究语言的对偶,以增强文章的韵律之美。如“学成而道益穷,年老而智愈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等,读来朗朗上口,气势贯通,有畅快淋漓之感。

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以他罕见的创作天才,突破了传统文体的框架,尤其是对魏晋六朝遗风的斩截,使古文从一般的应用

^① 韩愈:《答陈生书》,《全唐文》卷五五二。